

中
华
生
活
经
典

牡丹谱



【宋】欧阳修等著
杨林坤编著



中华书局

中华生活经典

牡丹谱

【宋】欧阳修 等著
杨林坤 编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牡丹谱/(宋)欧阳修等著;杨林坤编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11.8

(中华生活经典)

ISBN 978-7-101-08077-3

I. 牡… II. ①欧…②杨… III. 牡丹-观赏园艺 IV.
S685.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31219 号

-
- | | |
|-------|---|
| 书 名 | 牡丹谱 |
| 著 者 | [宋]欧阳修等 |
| 编 著 者 | 杨林坤 |
| 丛 书 名 | 中华生活经典 |
| 责任编辑 | 王水涣 |
| 出版发行 | 中华书局 |
| |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
| | http://www.zhbc.com.cn |
| | E-mail:zhbc@zhbc.com.cn |
| 印 刷 |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
| 版 次 |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
| | 2011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
| 规 格 | 开本/710×1000 毫米 1/16 |
| | 印张 12½ 字数 90 千字 |
| 印 数 | 1-8000 册 |
| 国际书号 | ISBN 978-7-101-08077-3 |
| 定 价 | 24.00 元 |
-

前言

“无双国色，独步天香。”素以“国色天香”、“花中之王”著称的牡丹，是原产于中国的名贵花卉。其绚丽多彩之色，纷繁幻化之形，沁人心脾之香，倾国倾城之姿，雍容华贵之态，艺压群芳，独领风骚，博得了“竞夸天下无双艳，独占人间第一香”的美誉。自盛唐两宋以后，牡丹逐渐被视为国家富强、繁荣昌盛的象征，至清末遂有“国花”之名。同时，牡丹还寄托着普通民众追求富裕尊贵、安泰祥和生活的美好夙愿，又以“富贵花”闻名天下。因此，历代中国人对牡丹都抱有极大的尊崇，倾注极大的热情。每当暮春牡丹开放之时，历史不断地上演“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的相同盛况。在这持久骚动与膜拜之风的助推之下，“佳名唤作百花王”的牡丹更以一种王者之姿，渗透于中国的思想、艺术、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之中，在诗词戏曲、绘画雕刻、建筑装饰、花卉园艺、工巧纹样，乃至人名地名等众多领域都崭露了华丽身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华美富强、蓬勃兴旺的重要精神象征之一。

一 牡丹的起源与传播

牡丹原产于中国，在我国有着悠久绵长的栽培历史。据说，早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已经有了把牡丹献给恋人以表达纯真爱情的动人诗句，由此算来，我国栽培牡丹的历史至少就有三千年了。

因外形和花姿较为接近，早期的野生牡丹被混称为芍药。后来，牡丹被称为木芍药，

仍然没有完全摆脱芍药的影子。郑樵《通志》云：“牡丹初无名，依芍药得名，故其初曰‘木芍药’。”牡丹为什么被称为“木芍药”呢？《本草纲目》解释说：“以其花似芍药，而宿干似木也。”直到秦汉时期，牡丹才从芍药中分离出来，并在文化史上留下了许多别名和代称。比如，牡丹又被称为鹿韭、花玉鼠姑、百两金、洛阳花、白术、天香国色、富贵花、谷雨花，等等。

其实，牡丹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都是荒野寂寞独自开，无人问津的。唐人舒元舆曾云：“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重所知。”他在《牡丹赋》中对牡丹的来历颇有怀疑：“焕乎美乎！后土之产物也。使其花之如此而伟乎，何前代寂寞而不闻，今则昌然而大来？”这么绚丽漂亮的珍贵花卉，为什么在唐代之前默默无闻呢？这涉及野生牡丹驯化培育的问题。今人在论及牡丹的早期驯育史时，往往提到北齐画家杨子华和南朝宋著名诗人谢灵运的相关记载，认为在南北朝时牡丹已经闻名于世。

持此论者又多举隋炀帝西苑的例子，云炀帝“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其中有“醉妃红”、“先春红”、“延安黄”等著名牡丹品种。然而《海山记》中关于易州向隋炀帝进贡牡丹的说法是不足为信的，极有可能是宋人的杜撰。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中明确指出：“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郑樵《通志》亦云：“牡丹晚出，唐始有闻。”明人徐渭《牡丹赋》中说：“兹上代之无闻，始绝盛乎皇唐。”另外，唐代类书《艺文类聚》也未收录牡丹。这些证据表明，隋代之前不可能有大规模栽植牡丹的现象发生，只能说存在野生牡丹零星驯化的例子。

牡丹真正以观赏花卉进入人们的视界，应当是在唐代。根据目前史料记载，一般认为牡丹引起唐朝统治阶层重视始于武则天时期。舒元舆《牡丹赋》云：“天后之乡西河（今山西汾阳）也，有众香精舍，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叹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浸盛。”此后，牡丹从皇宫禁苑，经由仕宦高第，向寻常巷陌传播，牡丹栽培也逐渐兴盛起来。人们把牡丹与武则天联系起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武则

天以女流而君临万邦，自然易使人联想到雍容华贵的奇花牡丹。另外，武则天为了给自己登上皇帝之位造舆论，还大量借用了佛教的势力和影响，而牡丹与佛教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从“曼陀罗花”到“借花献佛”，在唐初佛教的经典和仪轨中都出现了牡丹的身影。因此，唐初政局的变幻和佛教的广泛传播，为牡丹进入寻常百姓家创造了较好的社会条件。

到了唐朝开元年间，牡丹名品迭出，日渐盛于长安和东都洛阳。据李肇《松窗杂录》记载，“开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药”，“得四本，红、紫、浅红、通白者，上因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待到禁苑中牡丹花盛开时，唐玄宗李隆基诏杨贵妃共同赏玩，并命李龟年捧金花笺，宣翰林李白进《清平调》词三章。一时间“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之句传诵大江南北，成为文坛佳话。开元末，裴士淹奉使幽冀，途经汾州众香寺，偶得一株白牡丹，甚为惊异，遂植于长安私第，这是有关白花牡丹的最早记载。当时，洛阳有一位宋单父擅长种花，被玄宗召至长安，于骊山栽植了一万余本牡丹，红白斗艳，幻化多姿，被世人尊称为花师，表明牡丹栽培技艺有了较大发展。《酉阳杂俎》记载：“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可见唐代的牡丹不仅花色多彩绚丽，花型也愈益繁富，已经出现了复瓣重台牡丹。唐人舒元舆这样描写当时牡丹之盛：“今则自禁闼洎官署，外延士庶之家，弥漫如四渎之流，不知其止息之地。每暮春之月，遨游之士如狂焉。亦上国繁华之一事也。”白居易笔下的《买花》：“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不仅生动形象地展现了人们对牡丹的痴迷，还能从中看出，由于牡丹价格昂贵，欣赏牡丹成为达官贵人奢侈生活的一种象征，而普通百姓只能望花兴叹。

唐宋之际，伴随着洛阳牡丹的异军突起，中州地区逐渐发展成为北宋时期繁育牡丹

的中心，正如欧阳修所云：“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那时，北宋西京洛阳栽培和欣赏牡丹已然成为一大社会风尚，“大抵洛人家家有花”，牡丹真正走进了百姓之家，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以繁育牡丹为生的花户，有力推动了牡丹新品种的不断涌现。欧阳修在《洛阳牡丹记》中记载，当时有一位绰号“门园子”的花户，练就一手嫁接牡丹的高超技艺，富豪巨室争相请他嫁接牡丹。张邦基在《墨庄漫录》中也曾记载宋徽宗宣和年间洛阳的一位欧姓花匠，他能用药壅培在白牡丹根下，次年即能开出浅碧色花，极为珍贵，每年皆作为贡品供奉朝廷。在这些花匠和花户的辛勤努力之下，洛阳牡丹的繁育经验得到不断总结，成熟的牡丹花谱著作也相继问世。释仲休《越中牡丹花品》、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沈立《牡丹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等就是典型代表。这一时期，不仅黄河中下游地区牡丹繁盛，南方越州、滁州、和州等地也有了牡丹栽培。北宋末年，洛阳因战乱而致使牡丹衰败，牡丹繁育中心转移到了陈州（今河南淮阳）。陈州牡丹的最大特色是新品种倍增，且牡丹种植朝着规模化发展。张邦基《陈州牡丹记》：“洛阳牡丹之品见于花谱，然未若陈州之盛且多也。园户植花，如种黍粟，动以顷计。”北宋灭亡以后，牡丹繁育中心又南移到天彭地区（今四川彭州），遂有“小西京”之称。天彭牡丹多与洛阳牡丹有亲缘关系，但也有紫绣球、金腰楼、玉楼子等特有的名贵品种。陆游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天彭牡丹谱》，称其“有京洛之遗风”。

辽金时期，随着北京成为政治中心，牡丹开始在北京地区引种，并形成一定分布面积。元朝时期，牡丹名品寥寥可数，重瓣花朵几无可见。两宋时期的许多名贵牡丹品种正是在这一时期失传的，致使牡丹谱录在两宋与明清之间出现了明显断档。

进入明代，亳州又成为北方新的牡丹繁育中心。正德、嘉靖年间，薛凤翔的先辈西原、东郊二公非常喜欢牡丹，走遍四周郡县，搜访上好牡丹名品移植入亳州，从此亳州牡丹开始名扬天下，出现了“亳州牡丹更甲洛阳”的盛况。亳州牡丹的最大特征是种类繁多，育植迅速。薛凤翔曾经自豪地说：“永叔（欧阳修）谓四十年间花百变，今不数年百变矣，其化速若此。”导致亳州牡丹育种神速的原因，是当地人掌握了牡丹种子繁育的奥秘

和技巧，对于牡丹常用的嫁接繁育是一次较大突破。据《亳州牡丹史》记载，亳人“计一岁中，鲜不以花为事者”。每到牡丹花开之时，“虽负担之夫，村野之氓，辄务来观。入暮携花以归，无论醒醉。歌管填咽，几匝一月，何其盛也”。至隆庆、万历时期，亳州牡丹达到极盛。“亳中相尚成风，有称大家者，有称名家者，有称赏鉴家者，有称作家者，有称羽翼家者，日新月异，不知将来变作何状。”有明一代，不仅亳州牡丹盛极一时，安徽宁国、铜陵、江南太湖周围、西北兰州、临夏、临洮、广西灵川、灌阳等地的牡丹也有较大发展。北京极乐寺竟然出现了“国花堂牡丹”之称，这是目前关于称牡丹为“国花”的最早记载。

清代的牡丹繁育中心在曹州（今山东菏泽）。早在明代中后期，曹州牡丹就已经有了一定栽植基础，有“曹南牡丹甲于海内”之称。据《五杂俎》记载，曹州一士人家牡丹有种至四十亩者。入清以后，曹州牡丹“新花异种，竞秀争芳，不止于姚黄、魏紫而已也。多至一二千株，少至数百株，即古之长安、洛阳恐未过也”。至乾隆年间，曹州牡丹盛过亳州，正如《曹县志》所云：“亳州寂寥，而盛事悉归曹州。”清代曹州东北各村普遍种植牡丹，尤以赵楼、洪庙两地为最。另外，清代西北的牡丹后来居上，别具特色。比如，甘肃各府州都有牡丹，“惟兰州较盛，五色具备”。而河州（今甘肃临夏）牡丹也毫不逊色。清人吴慎有诗云：“牡丹随处有，胜绝是河州。”值得一提的是，清末为了办理外交事务的便利，慈禧太后曾下懿旨，将牡丹定为大清国的国花。

如今，中国牡丹不仅在港澳台地区落户，还传播到韩国、朝鲜、日本、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南非、澳大利亚等国家，成为世界知名花卉。早在唐太宗时期，牡丹就传入了新罗，其图样在北宋时期成为当地主要的织绣纹饰。唐德宗时期，日本高僧空海将中国牡丹传入日本，从此日本人民称牡丹为“唐狮子”。17世纪中叶，荷兰东印度公司将中国牡丹传入欧洲。一个多世纪以后，牡丹在英国邱园引种成功。此后英、法相继培育出黄花牡丹，为牡丹大家族增添了新的品种。20世纪20年代，美国植物学家洛克把甘南卓尼的紫斑牡丹引种到美国，使这一罕见的高原牡丹品种在大洋彼岸开出了绚丽花朵，也

为中美文化交往增添了新的佐证。

二 牡丹的花姿与品评鉴赏

“绝代只西子，众芳惟牡丹。”千百年来，牡丹以其华丽富贵、端庄大气的花姿折服了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人们不惜把最美好的词汇都献给牡丹，以表达内心的崇尚爱慕之情。在众多歌颂牡丹的作品之中，唐代诗人舒元舆的《牡丹赋》最具有代表性。对于“美肤腻体，万状皆绝”的牡丹花色花姿，他赞叹道：“赤者如日，白者如月。淡者如赭，殷者如血。向者如迎，背者如诀。坼者如语，含者如咽。俯者如愁，仰者如悦。袅者如舞，侧者如跌。亚者如醉，曲者如折。密者如织，疏者如缺。鲜者如濯（zhuó），惨者如别。初胧胧而上下，次鳞鳞而重叠。锦衾（qīn，被子）相覆，绣帐连接。晴笼昼薰，宿露宵裊（yì，用香熏衣）。或灼灼腾秀，或亭亭露奇。或飏（zhǎn，风吹颤动）然如招，或俨然如思。或带风如吟，或炫露如悲。或垂然如缢（zhuì，用绳子拴住物体下送），或烂然如披。或迎日拥砌，或照影临池。或山鸡已驯，或威凤将飞。其态万万，胡可立辨！不窥天府，孰得而见。”作者以细腻的观察，真实的体悟，形象的比喻，贴切的词汇，把牡丹的色、形、姿、态融贯于阴阳、浓淡、动静、喜悲、疏密的对比之中，实现了对牡丹雍容华贵精神的完美诠释。

在传统牡丹名品中，姚黄、魏花占有特殊的地位，姚黄被称为牡丹花王，魏花被称为牡丹花后。其实，牡丹品种的优劣高低是随着人们认识的不断加深和牡丹新品种的不断涌现而相应变化的。欧阳修曾经指出：“姚黄未出时，牛黄为第一，牛黄未出时，魏花为第一，魏花未出时，左花为第一。”从中可以看出人们审美递进、发展的过程。他在《洛阳牡丹图》诗中亦云：“当时绝品可数者，魏红窈窕姚黄肥。寿安细叶开尚少，朱砂玉版人未知。传闻千叶昔未有，只从左紫名初驰。四十年间花百变，最后最好潜溪绯。今花虽新我未识，未信与旧谁妍媸。当时所见已云绝，岂有更好此可疑。古称天下无正色，似恐世好

随时移。”诚如欧阳修所云，正因为“四十年间花百变”，故而“世好随时移”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何对牡丹品第进行欣赏和评判，这是一项专门的审美活动。明代赏花大家薛凤翔对此有精到的研究，并以神品、名品、灵品、逸品、能品、具品等六个级别来区分牡丹品第。

薛凤翔在《亳州牡丹表》中云：“昔班孟坚作人表，次第有九。钟嵘评诗，列品惟四。则物之巨细精粗必有分矣，况于神花变幻百怪总归巨丽，藉使欣赏失伦，则何以当造化、谢花神乎？”他认为班固作《汉书》，将历史人物分成九个层次，钟嵘写《诗品》也将诗作分为四类，看来事物无论大小精粗都要有所区分，何况变幻无穷的牡丹呢？如若不然，假使良莠不齐，优劣不分，品评牡丹没有规矩，那怎么对得起自然造化和花神呢？

他认为，凡是具备“意远态前，艳生相外，灵襟洒落，神光陆离，如伫如翔，欲惊欲狎，譬巫娥出峡，宓女凌波”这样姿容与品格的牡丹，都可以称作“神品”，比如天香一品、娇容三变、无上红等；凡是具备“玉润珠明，光华韶佚，瑰姿艳质，悸魄销魂，意者汉室之丽娟、吴宫之郑旦矣”这样容品的牡丹，皆可称为“名品”，如胜娇容、醉玉环之类是也；凡是具备“诡踪幻迹，异派殊宗，骋色流晖，不恒一态，岂龙螯乎，抑狐尾也”这样资质的牡丹，可称为“灵品”，譬如合欢娇、转枝等；而具备“品外标妍，局中竞秀，盈盈吴氏之绛仙，袅袅霍家之小玉”之姿态的牡丹，可称为“逸品”，如瓜瓞黄、非霞、洛妃之类；又有“绛唇玉貌，膩肉平肌，望灵芝于琼楼，阅丽华于藻井，都自撩人，总堪绝代”者，可称为“能品”，以珊瑚楼、菡月红、桃红凤头为代表；最后是“媚色娟如，粉香沃若，徐娘老去，毕竟风流，潘妃到来，犹然羞涩，大雅不作，余馨尚存”的品种，可称为“具品”，王家红、状元红、腰金紫之类是也。

三 牡丹富贵花说

自北宋哲学家周敦颐在《爱莲说》中首倡“牡丹，花之富贵者也”以后，牡丹为富贵

花之说胥而走，蜚声海内外。那么，牡丹为什么被称为富贵花呢？

近人赵世学在《牡丹富贵说》一文中称：“大凡花木之名，各有美称，非称之美也，称美而实有适当其美也。以故，莲有清洁之品，以君子称之。菊有晚节之馨，以隐逸称之。独牡丹有王者之号，冠万花之首，驰四海之名，终且以富贵称之。”那为什么牡丹以富贵称之呢？他进一步解释道：“吾观牡丹一花，谷雨开放，国色无双，有独富焉，群芳园中孰堪比此艳丽乎？天香独步，有良贵焉，众香国里孰堪争此芬芳乎？而且蕊放层叠，朵起楼台，粉黄黛绿，红白黑紫，灿然足观者，亦莫不色失万花，艳擅三春也。称之为富贵，谁曰不宜！是花也，秀开锦地，自昔极洛阳之盛景艳夺花国，于今我曹南而独盛，栽之培之，立万世无疆之业，近者远者，来四方有道有财。岂非天造地设，以养一方之人，而生此极富极贵之牡丹者欤？”他认为牡丹开放于谷雨时节，众花开败，无能与之竞争，故而称独富。又以香味超绝，无能与之媲美，因而称良贵。再以花型占全，花色占全，又能造福一方百姓，带来经济利益，因此得名富贵实属名至实归。从中不难看出，牡丹富贵有突出独傲、富强繁荣、全面兼备之义。

近现代另一位赏花大家毛同荃也对牡丹富贵之说有过独到见解。他在《富贵花说》中云：“清高者莲也，隐逸者菊也，孤瘦者梅也。清高则有轻乎富贵之度，隐逸则有弃乎富贵之容，孤瘦则有远乎富贵之想。然不意富贵而以富贵称者，乃有牡丹。闲尝览群芳之谱，牡丹为最，非以其富丽堪爱，贵容堪寡，足以动人之观瞻也，亦有他故焉。”他并不认为牡丹仅凭富丽花色和尊贵花容就得富贵之名。他接着分析道：“夫当风和日丽，时过谷雨，次第而开，艳朵层叠，富有三春之盛，楼殿辉煌，贵为万花之王。斯时也，不惟修花地主，恍若富贵之翁，即看花人到，亦尽若贵门之胄。噫嘻，锦城香国，观乎牡丹而花之众美毕俱矣，宜乎称为富贵花也。”毛同荃的可贵之处是把牡丹的富贵精神移植到了个人道德修养之中，他感叹道：“惜也，富贵仅在于牡丹也。使富贵而在于人，则忠信孝悌，固有之富也，有以修之，将心花灿烂矣。仁义道德，人之良贵也，有以培之，将意蕊芬芳矣。由是，佩实衔华，名芳一世，岂不胜于天香染处、国色酣时也哉！”

由此看来，将牡丹富贵之精神外化于国家，可比之于国家繁荣昌盛、崛起屹立、全面蓬勃发展；将牡丹富贵精神内化于个人，可寓之以毕俱全德、积极向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才是超然于财富观念与等级观念之上的中华牡丹之富贵真精神。

四 唐人爱牡丹与宋人谱牡丹

“春尽方开，香居第一。花时竞赏，艳更无双。”国色天香，世人皆爱的牡丹，在唐宋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意象中却有了不同的命运，折射出两朝社会迥异的精神文化特征。

唐人对牡丹表现出的是浓烈而张扬的挚爱。虽然唐代的牡丹还没有形成种植规模，品种也未必如宋代那样繁多，且价格不菲影响到它向民间传播，但这些都不能阻碍唐人对牡丹的如醉如痴。《唐国史补》卷中《京师尚牡丹》条说：“每春暮，车马若狂，以不耽玩为耻。”这表明每当暮春牡丹盛开时，京城长安就成为赏花的狂欢节和嘉年华，人人皆以尽兴为欣爽。当时，既有“长安牡丹开，绣毂辗晴雷”、“城中看花客，旦暮走营营”、“牡丹花际六街尘”、“游花冠盖日相望”的喧嚣与热闹，又有“欲就栏边安枕席，夜深闲共说相思”、“闲年对坐浑成偶”、“万事全忘自不知”、“诗书满架尘埃扑，终日无人略举头”的缠绵与忘我。在这种对牡丹举世皆痴狂的真情感染之下，唐代诗词歌赋中出现了大量有关牡丹的文学作品。从李正封的“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到刘禹锡的“唯有牡丹真国色”和李山甫的“一片异香天上来”；从白居易的“千片赤英霞烂烂”、“光风炫转紫云英”，到方干的“花分浅浅胭脂脸”；从王建的“并香幽蕙死”，到薛能的“奇香称有仙”；从李商隐的“荀令香炉可待熏”，到唐彦谦的“馨香惟解掩兰荪”；从徐夔的“万万花中第一流”、“羞杀千花百卉芳”，到刘禹锡的“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的“一城之人皆若狂”。牡丹那炫人的花色，撩人的花姿，沁人的花香，引得众生接踵流连，推崇膜拜。它在唐人笔下永远是那么热烈奔放，充满着盛唐气象的韵味，好似这奇异的仙葩就是为强盛的大唐而生的。

时光流入两宋，人们对牡丹的挚爱丝毫没有减退。正如欧阳修所云：“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往往于古寺废宅有池台处为市，并张幄帘，笙歌之声相闻。”亦如司马光所道：“洛阳春日最繁华，红绿阴中十万家。”不仅冠盖绣毂无减大唐，还增添了更多鲜活可亲的间阎市井风情。然而这一时期，文人士大夫对牡丹的感情却变得微妙起来。虽然宋代诗词作品中仍然大量出现牡丹的情影，亦不乏像欧阳修“洛阳地脉花最宜，牡丹尤为天下奇”、张子望“只道人间无正色，今朝初见洛阳春”、邵雍“须是牡丹花盛发，满城方始乐无涯”这样脍炙人口的佳句，但如像苏轼“漏泄春光私一物，此心未信出天工”之句却也道出了几分冷静与理性。

众所周知，宋代文人士大夫普遍秉持清韵绝俗的人格风尚，他们见不得色艳香浓，见不得流光溢彩，见不得张力十足的美，而喜见质朴自然，恬淡闲适之美。据有学者统计，《全宋词》中作为植物意象出现次数最多的是神清骨冷的梅，累计达2953次，而国色天香、雍容华贵的牡丹并不在宋代文学作品中独占花魁。那么，据此是否可以推定宋代文人士大夫不喜欢沾染了世俗气的牡丹呢？非也。因为恰恰是在两宋时期，涌现了大量记载牡丹的“植物写作”，其中许多还是牡丹的专门著作。两宋时期有关牡丹的植物写作主要有：释仲休《越中牡丹花品》，钱惟演《花品》，范雍《牡丹谱》，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丁谓《续花谱》、《冀王官花品》、《庆历花品》，沈立《牡丹记》，周师厚《洛阳牡丹记》和《洛阳花木记》，张岫《洛阳花谱》，丘璿《牡丹荣辱志》和《洛阳贵尚录》，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胡元质《牡丹谱》，任琦《彭门花谱》、《牡丹芍药花品》等。如此数量庞大的牡丹谱录著作，似乎与宋代文人对牡丹抱有的某种矜持情感相矛盾，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相对于唐人的激情浪漫，宋人似乎以理性冷静著名。在“格物致知”的过程中，由于体认和主张的不同，宋人产生了气本派、理本派、心本派的差异。以牡丹为例，大概欧阳修有点朴素气本派的意味，所以，他在解释洛阳牡丹“独天下而第一”的缘故时，将之

归结为气之偏好。经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这也并不是宋人特有的理性，而是承袭唐人而来。唐舒元舆《牡丹赋》开篇即云：“圆玄瑞精，有星而景，有云而卿。其光下垂，遇物流形。草木得之，发为红英。英之甚红，钟乎牡丹。拔类迈伦，国香欺兰。我研物情，次第而观。”舒元舆将自然界孕育出牡丹这样的奇葩，归因于“圆玄瑞精”运行演变的结果。他认为“圆玄瑞精”生而有星有云，星云之光照得草木，既而发为红英，红英又钟萃于牡丹。两相对比可以看出，从舒元舆的“圆玄瑞精”到欧阳修的“中和之气”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后者更显抽象概括而已。由宋人谱录牡丹的例子可知，原来一草一木，一花一叶，在宋代文人眼中皆不简单，都有其哲学思辨的意象。

本书在整理点校的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以现存最早的刊本为底本，以后世较好的刊本或点校本为参校本。即欧阳修《洛阳牡丹记》以宋刻咸淳左圭《百川学海》本为底本，周师厚《洛阳牡丹记》以《古今图书集成》本为底本，张邦基《陈州牡丹记》以宛委山堂《说郛》本为底本，陆游《天彭牡丹谱》以明末毛晋汲古阁刻《陆放翁全集》本为底本；

二是底本缺文之处，以“□”符号标出；

三是诸谱内容编排皆按解题、原文、注释、译文、点评等五部分排列，段落划分保留底本原貌，对于资料甚少的条目不强行臆测点评；

四是部分注释内容参考了《辞源》、《汉语大字典》、《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工具书；

五是存疑之处，皆以“杨按”按语形式注明。

由于鄙人知识和水平所限，书中还存在许多问题，特此请方家不吝赐教！本书在整理和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中华书局张彩梅副编审、王水涣编辑和美术设计部毛淳主任等其他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国运昌时花运昌”，本书结稿之时，古老的东方大国正走在富强崛起的路上。而于

鄙人内心则有深刻之洗礼，效之宋人吟出一句与读者共勉：

龟勉为学求精进，诚正修身苟日新。

谨志之。

杨林坤

于兰州大学萃英门

2011年辛卯夏月

目 录

洛阳牡丹记·····	[宋] 欧阳修	1
花品序第一·····		3
花释名第二·····		21
风俗记第三·····		52
洛阳牡丹记·····	[宋] 周师厚	69
各种牡丹·····		71
陈州牡丹记·····	[宋] 张邦基	125
天彭牡丹谱·····	[宋] 陆游	133
花品序第一·····		135
花释名第二·····		145
风俗记第三·····		175

牡丹谱

洛阳牡丹记

〔宋〕欧阳修

